

宋

書

宋書

梁 沈約 撰

第一冊
卷一至卷三（紀志）

中華書局

宋 書

(全 八 冊)

[梁] 沈 約撰

*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(北京人民路 36 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裝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79⁵/₈。印張·1400 千字

1974 年 10 月第 1 版 197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統一書號：11018·639 定價：7.60 元

宋書

梁 沈約撰

第 二 冊
卷一四至卷二二（志）

中 華 書 局

宋書

梁 沈約 撰

第 三 册
卷二三至卷三四（志）

中 華 書 局

宋書

梁 沈約撰

第 四 冊
卷三五至卷四一（志傳）

中 華 書 局

宋書

梁 沈約 撰

第 五 冊
卷四二至卷五八（傳）

中 華 書 局

宋書

梁 沈約 撰

第 六 冊

卷五九至卷七二（傳）

中 華 書 局

宋書

梁 沈約撰

第七冊

卷七三至卷八四（傳）

中華書局

宋書

梁 沈約 撰

第 八 册

卷八五至卷一〇〇(傳)

中 華 書 局

出版說明

一

《宋書》一百卷，包括本紀十卷，志三十卷，列傳六十卷，梁沈約撰。

宋是繼東晉以後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。晉安帝隆興二年（公元四〇三年），荊州刺史桓玄代晉稱帝。第二年，當時的北府兵將領劉裕在京口（今江蘇鎮江市）和廣陵（今江蘇揚州市）兩地起兵，推翻桓玄，名義上恢復晉朝的統治，實際上掌握了東晉的軍政大權。過了十五年，晉恭帝元熙二年（公元四二〇年），劉裕就建立宋朝，都於建康（今南京）。劉裕以後，一共傳了七代，到宋順帝昇明三年（公元四七九年），又爲蕭齊所滅。

宋朝國史的修撰，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（公元四三九年）就已開始。當時由著名科學家何承天草立紀傳，編寫了《天文志》和《律曆志》。此後，又有山謙之、裴松之、蘇寶生等陸續參預編撰。但他們任史職的時間都很短。大明六年（公元四六二年），徐爰領著作郎，他參照前人舊稿，編成「國史」，上自東晉義熙元年（公元四〇五年），劉裕實際掌權開始，下訖大明時止。《隋書經籍志》著錄徐爰《宋書》六十五卷，可見他的書曾和沈約《宋書》並行，現

在《太平御覽》等類書中，還保存了徐爰《宋書》的殘篇零段。但徐爰不久爲宋朝所斥退，宋朝「國史」的修撰也就停了下來。南齊永明五年（公元四八七年）春，又命沈約修撰《宋書》。這時沈約爲太子家令，兼著作郎。他依據何承天、徐爰等人的舊作補充修訂，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，在永明六年（公元四八八年）二月完成紀傳七十卷。沈約在當時的奏文中說「所撰諸志，須成續上」，可見《宋書》的八志三十卷，是後來續成的。在八志中，《符瑞志》改稱鸞鳥爲神鳥，是避齊明帝蕭鸞的諱；《律曆志》改「順」作「從」字，是避梁武帝父親蕭順之的諱；《樂志》稱鄒衍爲鄒羨，是避梁武帝蕭衍的諱。可見《宋書》的最後定稿，當在齊蕭鸞稱帝（公元四九四年）以後，甚至在梁武帝即位（公元五〇二年）以後了。

與沈約同時或稍後，南齊時有孫嚴著《宋書》六十五卷，王智深著《宋紀》三十卷，梁代有裴子野著《宋略》二十卷，王琰著《宋春秋》二十卷，鮑衡卿著《宋春秋》二十卷。但這些著作都已亡佚，關於劉宋一代的史書，比較完整的，現在就只有沈約的這部《宋書》。

沈約（公元四四一——五一三年），字休文，吳興吳康（今浙江德清縣西）人。他歷仕三朝，宋時爲尚書度支郎，齊代做到五兵尚書、國子祭酒，在齊梁政權交替之際，他力勸梁武帝蕭衍代齊稱帝，因而在梁朝被封爲建昌侯，官至尚書左僕射、尚書令、領中書令。沈約的著作很多，但現在除了《宋書》一百卷和文集九卷外，其他如《晉史》、《齊紀》、《梁高祖紀》、

《宋文章志》等，都已亡佚。

二

東漢末年以來所形成的門閥制度，到東晉南北朝時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。門閥士族擁有政治經濟各方面的特權，他們大量兼併土地，廣泛收羅「蔭戶」，用各種手段霸佔勞動力，極端殘酷地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。他們以門第相誇，把持官位，所謂「貴仕素資，皆由門慶，平流進取，坐致公卿」（《南齊書·褚淵王儉傳論》）。梁武帝蕭衍也極力支持士族，他在詔書中還特別提到了要糾正「冠履倒錯，珪瓊莫辨」的現象（《梁書·武帝紀》）。沈約先世，本是吳興士族，所謂「江東之豪，莫強周、沈」（《晉書·周處傳》附周札傳）。沈約一門，在宋、齊、梁三代，也都仕宦顯赫。梁蕭統《文選》載沈約《奏彈王源》文，對於某些士族地主「婚宦失類」的情況大加抨擊。因此，沈約在齊梁時期撰成的《宋書》，也就帶有其時代和階級的特點，它的一個突出內容，就是大肆吹捧豪門士族，維護封建社會最腐朽黑暗的門閥制度。

《宋書》列傳中，有關地主階級中代表人物高門士族的傳，幾乎佔了半數。僅就王、謝二族來說，《宋書》裏王氏立傳的達十五人，謝氏立傳的也近十人之多。像陳郡謝弘微，

傳中寫他如何忙於經營謝氏產業，傳末却又吹捧他爲人「簡而不失，淡而不流」。又如琅邪王徽，傳中只是連篇累牘收載他給友人的信，却說他「內懷耿介，峻節不可輕干」。這兩個入因爲都是高門士族，所以《宋書》都爲他們立了「佳傳」。《宋書》中對於士族中的人物，總說什麼是「前代名家」，風度「簡貴」，「風格高峻」，「世重清談，士推素論」，等等。而對於像鮑照那樣在作品中表現了對門閥制度反抗的詩人，又由於他出身寒微，就只附見於臨川王子義慶傳中。至於廣大的勞動人民，在沈約的心目中，就更不值一提了。這是對歷史的嚴重歪曲和顛倒。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。勞動人民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。在整個東晉南朝時期，西起巴蜀，東至沿海一帶，都有農民起義爆發，一次又一次地打擊了門閥制度。江南的各族人民，用他們的辛勤勞動，創造了物質財富，促進了長江流域及整個南方經濟的發展。而那些豪門士族，不僅政治上十分反動，而且生活上腐爛透頂。沈約無論用什麼樣的詞藻，也掩蓋不了這批社會寄生蟲那種貪婪自私、不學無術而又矯情虛偽的醜惡面目。

在整個南朝，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始終十分尖銳。就在沈約奉命修史的前幾年，發生了富陽人唐寓之的農民起義，衆至數萬人。齊末梁初，都不斷有農民起義發生。由於社會矛盾的加深和農民起義的發展，士族大地主爲了維護其反動統治，就大搞尊孔復禮的活

動。宋、齊、梁三朝都忙於纂修五禮。蕭齊永明年間，數次下詔祭孔。梁武帝更是大力提倡儒教，「專事衣冠禮樂」。他自己編撰了《羣經講疏》二百多卷，又立五經館，置五經博士。沈約《宋書》的另一突出內容，就是崇尚禮樂，鼓吹反動的儒教，以配合豪門士族在思想文化方面搞所謂「世代傳經」的需要。《宋書》臧熹等傳後面的史論說「六經奧遠，方軌之正路，百家淺末，捷至之偏道」，明確提出治理國家要以儒家的六經作為根本。同時對曹操的法家路線大加抨擊，說「自魏氏膺命，主愛雕蟲，家棄章句，人重異術。又選賢進士，不本鄉閭」，並且慨歎地寫道：「自黃初至於晉末，百餘年中，儒教盡矣。」

值得我們注意的是，東晉末年孫恩、盧循在今浙江東部發動的一次著名的農民起義，不僅在政治、經濟上給予王、謝大族以沉重的打擊，而且有力地掃蕩了孔孟之道的反動意識形態。《宋書·謝方明傳》記載說：「于時荒亂之後，吉凶禮廢，方明合門遇禍，資產無遺。」但傳中以贊美的口吻描寫了謝方明如何營舉葬事，「平世備禮，無以加也」。這恰好說明了南朝禮學發達的社會基礎，正是豪門士族，而他們之所以拚命抓住禮學不放，正是出於鞏固其反動統治，妄圖進一步鎮壓農民反抗的需要。

《宋書》八志，《禮志》佔了五卷，《符瑞志》、《五行志》加起來有八卷。尤其是《符瑞》、《五行》二志，集中宣揚了儒家的天命論思想。《符瑞志》上起宓戲、神農，下到宋明帝劉彧，

用隱語、讖書、觀星、望氣、風水、相術、巫卜，來說明歷代帝王的「受命之符，天人之應」。沈約還全文引用了西漢末年班彪所寫的《王命論》，說什麼「神器之有授無貪」，「貧窮亦有命也」，叫人要「知命」。這幾個志裏把儒家經典和宗教迷信結合起來，它的中心內容仍然是尊孔復禮，只不過是用神秘的唯心主義思想，來加強門閥士族對廣大勞動人民的專政。

三

《史通·書志篇》說：「宋氏年唯五紀，地止江淮，書滿百篇，號爲繁富。」《宋書》百卷，記述六十年間的史事，保存了不少歷史資料，尤其是它收載了當時人的許多奏議、書札和文章，可以從中看出那個時期社會、政治、經濟的一些實際情況。如卷八十二《周朗傳》載周朗上書，講到賞調的爲害，嚴重阻礙了當時生產力的發展。卷五十六《孔琳之傳》、卷六十《范泰傳》、卷六十六《何尚之傳》所載關於改鑄錢幣的爭議，反映了封建統治者如何在錢幣改鑄中加緊對人民的剝削。卷五十四《羊玄保傳》、兄弟羊希附傳，收載西陽王子尚上書，提到南朝初期農村兩極化的發展，「富強者兼嶺而佔，貧弱者樵蘇無託，至漁採之地，亦又如茲」。卷六十七《謝靈運傳》載謝靈運的《山居賦》全文，提供了研究大地主莊園的材料。

從《宋書》的記載中，還可以看出那時的農民起義不但人數衆多，而且地域很廣，規模

很大。如景平元年（公元四三三年），有富陽孫法光領導的起義（《少帝紀》、《褚叔度傳》）。元嘉九年（公元四三二年），有廣漢趙廣領導的起義，人數有十多萬人，起義軍圍困益州治所成都達數月之久（《文帝紀》、《劉粹傳》、《弟道濟附傳》）。另外，在元嘉初年，有浙川、丹川的少數族起義，到元嘉末年，荆、雍、豫三州的少數族人民，起義就更加頻繁，參加的人數有發展到百餘萬人以上的（《夷蠻傳》、《張邵傳》、《沈慶之傳》等）。這些記載雖然是極不充分，而且還是經過嚴重歪曲的，但終究爲我們提供了研究當時階級矛盾、階級鬥爭的綫索。

此外，《宋書》的《謝靈運傳》及傳末的史論，談到了魏晉以來文學的發展和演變，以及沈約自己關於詩歌聲律的主張，是研究六朝文學批評史的重要資料。《夷蠻傳》對於南朝前期我國和亞洲各國人民之間經濟、文化的友好交往，也作了適當的敘述。

在《宋書》八志中，有些志是比較可取的，如《律曆志》收了楊偉的《景初曆》全文，以及何承天的《元嘉曆》、祖沖之的《大明曆》全文，這幾種曆法都是能够反映當時自然科學水平的著作。《樂志》保存了許多漢魏樂府詩篇。《州郡志》對南方地區自三國以來的地理沿革，以及東晉以來的僑置州郡分布情況，講得比較詳細。而且在每個州郡名下，都記載着戶口數。這些戶口數固然不盡準確可信，但多少使人得知當時南方人口分布的一個大概輪廓。